

論新加坡新聲詩社舊體詩詞中“中國意識”的轉變 ——以 1957-1985 年端午“詩人節雅集”為例

張玉

論 文 摘 要

舊體詩詞創作與“詩人節”紀念屈原的活動，兩者皆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本文以 1957 年成立的新加坡新聲詩社為研究對象，以紀念屈原的端午“詩人節”雅集為切入點，探討舊體詩詞作品中“中國意識”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呈現問題。新聲詩社成立於新加坡自治前夕、逐漸成長於新加坡獨立之後，隨著國家意識的不斷強化，烙有傳統印記的“詩人節雅集”作品，從對“南洋風物”的書寫、到自我身份的“雙重肯定”、再到對本地生活及文教事業的關注，都展露出詩人的“中國意識”逐漸發生明顯的轉變，其表現形式也變得豐富多樣。究其轉變原因則與詩人身份變化、新加坡社會本土意識不斷增強有著密切的關聯。

關鍵詞：端午雅集 新聲詩社 國家意識 本土意識

前言

學界對於馬新文學中舊體詩研究的關注不多，而舊體詩卻是研究馬新華文文學的起點。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一書指出，1881年12月《叻報》創刊，正式掀開馬新舊文學的序幕。¹新加坡舊體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無法切割的關聯，1949年以後新加坡華僑雖然在政治上被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系，但以南來文人為主的新加坡舊體詩壇卻未因此而凋敝，其創作中仍帶有強烈的“僑民意識”或“中國意識”。無論新文學或舊體詩，“地方色彩、本地意識和僑民意識（中國意識）的角力顯然是這場歷史劇的主軸”，²它們的發展都呈現一個“逐漸脫離中國文學，構建本土文學傳統，融入新加坡本土文化發展的進程”³的態勢。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一文將新加坡舊體詩的發展分為：早期“過客和流寓者”的舊體詩創作，以邱菽園為代表的新加坡詩人，儘管他們仍視中國為祖國，但作品中早已流露“雙鄉意識”；新加坡建國後，以潘受、張濟川為代表的新國民詩人，其“本土意識”更為濃烈，但作品中仍表現出“強烈的中華屬性”。⁴如此梳理使得新加坡舊體詩的發展脈絡更為清晰，本文據此選取《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1957）、《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1958）、《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1961）等特輯，1957-1983年《南洋商報》刊載的詩人節雅集作品為研究對象，從“詩人節”緣起與新聲詩社成立入手，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南來詩人創作的影響，從早期詩人節到新加坡建國前後詩人節雅集作品中“中國意識”書寫轉變與“本土意識”呈現之現象進行分析，嘗試還原詩社作品逐漸由濃厚的“中國意識”向多元的“本土意識”之過渡，以及詩人身份認同的確認。

一、“詩人節”緣起與中國傳統

首以端午節作為“詩人節”紀念愛國詩人屈原，最早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

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部份經費。

¹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

² 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收入《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頁172。

³ 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197。

⁴ 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東方文化》2015年第1期，頁73。

郭沫若⁵、老舍、臧雲遠等人代表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所提出。“文協”於1941年召開第一屆“詩人節”大會，郭沫若、老舍、于右任皆有演講，會上朗誦屈原《離騷》、即興賦詩，並將每年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訂為詩人節，⁶最後發表名為《詩人節緣起》的宣言，⁷宣稱：“目前是體驗屈原精神最適切的時代。”⁸倡導屈原的愛國精神對抗戰具有積極的宣傳意義，“詩人節”至少連續辦了兩屆，後因國民黨政府的反共高潮，詩人們各自分散，“詩人節”也因此中斷，偶爾只在一些文人圈子裏進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並沒有恢復慶祝“詩人節”，而“臺灣詩人卻年年歡度詩人節”。⁹此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首先，“詩人節”在四十年代曾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論，焦點圍繞在屈原的“愛國詩人”身份與端午節是否為了紀念屈原的歷史問題。¹⁰這些爭論的背後是當時國、共政治力量的競爭與此消彼長，兩黨的文人代表皆利用屈原形象與傳統文化來宣揚各自的政治主張，著重於對自己有利的宣傳。感懷屈原詩歌中“忠信見逐”以及對昏庸統治者的指責，兩黨於1949年前後對“詩人節”的態度顯然不同。對共產黨而言，端午節與屈原所代表的傳統的“舊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後已不宜再提倡，尤其屈原的作品代表了對時代的不滿；而流寓臺灣的一些詩人適可借此樹立傳統文化的“正統”形象，如于右任（1879-1964）在1955年臺南詩人節大會上發表演說，“贊揚了三百年來臺灣的詩社、詩風”，並闡述要紀念屈原的原因，“一是紀念其作品的偉大，一是紀念其人格的崇高”，提倡詩人要有“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的殉道精神。¹¹于右任幾次在臺灣詩人節大會的講話中都隱隱流露一種以“屈原放逐”自比的意味，而這種意味也是1949年以後臺灣“詩人節”紀念活動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曾經參加1941年“詩人節”大會的易君左（1899-1972），其於1956年出版的《華僑詩話》中記述臺灣詩人節大會的盛況，提到此次大會中有不少海外僑胞詩人紛紛響應，在香港的詩人節慶祝活動也有“外籍詩友的漸漸合流”，而旅菲（律賓）華僑詩人中也有關於詩人節的歌詠。¹²從《華僑詩話》所述，可知易君左與東南亞華僑詩人的往來酬唱十分頻繁，而1957年在新加坡首次的詩人節雅集

⁵ 郭沫若於抗日戰爭時期創作了大型歷史劇《屈原》，借屈原的故事諷喻當時的政局。

⁶ 常久：《“詩人節”的由來》，《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頁39。

⁷ 泯：《第一屆詩人節》，《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2期，頁61。

⁸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1年“文協”刊出的詩人節緣起》，《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頁17。

⁹ 霍松林：《詩人節與于右任在臺灣詩人節大會上的演說》，《中華詩詞》2011年第8期，頁62-63。

¹⁰ 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詩人節及其爭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1期，頁1-20。

¹¹ 霍松林：《詩人節與于右任在臺灣詩人節大會上的演說》，頁62-63。

¹² 易君左：《華僑詩話》，香港：著者，1956，頁13-16。

的出現，正是響應易君左等人對“詩人節”的提倡與推廣。

二、早期新聲詩社“詩人節雅集”與“中國意識”

（一）“詩人節”與新聲詩社

新聲詩社以“詩人節”為契機，成立於1957年雙林寺的端午節雅集。此是新加坡首次大規模的以“詩人節”為名的雅集，與會詩人卅餘位，包括當時頗有詩名的謝雲聲（1900-1967）、葉秋濤（1906-1973）等。雅集中公議籌組新加坡“新社”，推舉葉秋濤、謝雲聲、林志高、倪啟紳等起草章程，邀請華社著名領袖李俊承（1888-1966）為領導者。謝雲聲稱：

本日雅集，為紀念詩人屈原憂時愛國自我犧牲的精神及寓有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意旨，同文之間，除文章熏陶外，還有道義的輔助，此後希望逢有良辰佳節，擬再繼續舉行，借以振作文風，而挽風雅。¹³

可見“新社”最初成立的目的有三：一、紀念愛國詩人屈原；二、以文會友；三、振作文風，發揚傳統。其於屈原評價則稱“憂時愛國，行吟澤畔，作自我犧牲的消極詩人”¹⁴，此與于右任所謂的殉道精神一脈相承。1957年的新加坡正值自治前夕，各族人民可通過法律程序登記為新加坡公民，從英殖民地政府手中獲得較多的權益，這也為舊體詩人依法申請成立詩社提供“以文會友”的條件。而在振作文風方面，部份詩人以“遺民”自居，提出“華風遠播，海國增光”的理想，也有詩人只是單純希望繼承“傷心詠嘆，慷慨激昂，伸紙揮毫，陳辭遣句，述往事，追來者，以遂其誌之思”的抒情傳統。¹⁵

據《南洋商報》載，“新社”成立之初並非順利，從1957年公議籌組“新社”，到1958年改名“新聲詩社”並推舉籌備委員，再到召開發起人大會、進行申請註冊，直至1959年4月才正式獲准註冊，歷時近兩年。¹⁶在此期間，除了

¹³ 謝雲聲等：《新加坡丁酉詩人節雅集會贈言》，《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57，頁3。

¹⁴ 謝雲聲等：《新加坡丁酉詩人節雅集會贈言》，《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頁3。

¹⁵ 林素允：《戊戌詩人節雅集紀盛》；洪來儀：《詩人節賦》；林志高：《愛國詩人屈原》，《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58，頁6、4、2。

¹⁶ 新加坡《南洋商報》1958年6月23日、7月21日、8月18日、1959年4月4日分別有《端陽節詩人雅集大會籌組“新社”改稱“新聲詩社”並推舉籌備委員多人》、《新聲詩社舉行首次籌委會會議通過要案多宗訂下月中召開發起人大會》、《新聲詩社章程草案通過進行申請註冊》與《新聲詩社註冊獲准》的報道。

1957年雙林寺雅集，1958年詩人節雅集有四十八人參加，包括來自香港、印尼詩人，出版《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收錄詩詞作品一百零一首，詩歌體裁豐富多樣。1960年“庚子詩人節”，新聲詩社參與南洋大學中文系第一屆畢業典禮的“雲南園雅集”，中文系教授劉太希（1898-1989）也參與其盛。1961年“辛丑詩人節”，新聲詩社與南洋大學師生在陳六使的丹絨禺寓所舉行雅集，出版《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收錄詩詞作品一百七十三首，無論在題材、體裁或創作水平，都達到早期“詩人節”雅集的一個高峰。

根據筆者所得全部有關新聲詩社的詩人節雅集資料，新聲詩社大規模的“詩人節雅集”活動，或於1962-1970年間中斷了九年之久。社員方煥輝（1922-？）《有餘書屋吟草》中，他寫於1971年“辛亥詩人節雅集”的《端午新聲詩社雅集賦呈社長陳寶書》詩自註云：“壬寅（1962）中秋、重九、癸卯上元、花朝，幾度唱酬，轉眼十年於茲矣。”¹⁷ 陳寶書（1900-1984）《留星室吟草》中有《庚戌詩人節前一日雅集鳳凰樓》一詩，¹⁸ 經考證應作於1970年端陽前一日；馬宗薌《吟香詩集》中也有一首《詩人節前一日讌集感賦》，¹⁹ 雖未標明創作時間，用韻卻與陳寶書《庚戌詩人節》一詩完全相同。其他社員作品集和報章資料中亦不見相關報道和詩作。筆者推測，陳寶書、馬宗薌等或於1970年舉行小型詩人雅集並作此詩，並非公開的雅集活動，如此則與方煥輝詩自註所言相符，新聲詩社此前大規模的詩人節雅集確是中斷了，直至1971年6月4日《南洋商報》報道的“辛亥詩人節雅集”，才又延續此前的傳統活動。

由於中斷時間較長，參與雅集的詩人也出現較大的變動，故本文將“詩人節雅集”分為早期（1957-1961）和後期（1971-1985）兩個時段。具體資料如下：

表一：新聲詩社1957-1985年“詩人節雅集”及作品資料表

時期	序號	年份	名稱	參與詩人	作品
早期	1	1957	丁酉詩人節雅集	李俊承、謝雲聲、葉秋濤等三十三人	詩48首
	2	1958	戊戌詩人節雅集	李俊承、曾心影、蔡寰青等四十八人	詩詞共101首（詞2首）

¹⁷ 方煥輝：《有餘書屋吟草》，新加坡：嘯濤篆刻書畫會，1999，頁5。陳寶書詩集《留星室吟草》中有詩作可印證方煥輝所提及的壬寅中秋、癸卯花朝等唱酬，直到1970年之前再無其他雅集詩作，印證了方氏所感慨的十年後才再度唱酬。（陳寶書：《留星室吟草》，臺北：海天印刷廠有限公司，1976，頁124-126。）

¹⁸ 陳寶書：《留星室吟草》，頁161。

¹⁹ 馬宗薌：《吟香詩集》，新加坡：新生社，1971，頁69-70。

	3	1960	庚子詩人節雅集	劉太希、黎國昌，謝雲聲、李俊承、曾心影等三十二人	詩 38 首，刊於《南洋商報》
	4	1961	辛丑詩人節雅集	新聲詩社成員四十餘人與南大師生十餘人，共五十二人	詩詞作品共計 173 首
	1962-1970		其間報章、文集未見公開、具規模的雅集信息。		
後期	5	1971	辛亥詩人節雅集	黃勗吾、潘受、陳寶書、方煥輝、謝夢齡等四十餘人	方煥輝、陳寶書詩各 1 首 ²⁰
	6	1977	丁巳詩人節雅集	陳寶書、馬宗薌、張濟川等十八人	詩詞賦共計 29 首（篇）
	7	1979	己未詩人節雅集	陳寶書、林炳文、馬宗薌等二十人	詩詞共 36 首
	8	1983	癸亥詩人節雅集	陳寶書、歐陽澄、謝夢齡等十六人	詩詞共 60 首
	9	1984	甲子詩人節雅集	馬宗薌、張濟川、許乃炎等十人	詩詞共 27 首
	10	1985	新粵乙丑詩人節雅集	新聲詩社、中國廣州詩社	詩詞約 170 首

以上所列十次的詩人節雅集，均為新聲詩社有報章報道或出版資料記載的、公開的、頗具規模的詩人節雅集。

（二）早期“詩人節雅集”作品中的“中國意識”

1957 年“詩人節雅集”作品全部收錄於《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一書，²¹ 體裁為五律和七律，題材也較簡單明確，大致分為歌詠屈原和紀念雅集盛況兩種。在這樣的題材下，詩人往往流露“客居”的感受，如李俊承詩云：

佳節庚酬唱，天南第一聲。只憐為客久，無意以詩鳴。吊古懷先哲，
匡時仗後生。等閒觀世變，宜醉不宜醒。²²

²⁰ 《南洋商報》1971 年 6 月 4 日刊載《本邦詩人盛事：新聲詩社舉行雅集榜鵝酒家吟哦賦詩》的報道，但未刊任何作品。方煥輝《有餘書屋吟草》中有《端午新聲詩社雅集賦呈社長陳寶書先生》一首、陳寶書《留星室吟草》中有《辛亥端午節後一日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水榭》一首，當作於 1971 年此次詩人節雅集。

²¹ 新聲詩社早期“詩人節雅集”詩歌均為同題作品，如 1957 年雅集作品全部以“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為題，1958 年全部以“戊戌詩人節雅集”為題，1961 年全部以“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為題。至 1979 年己未詩人節雅集，各人作品始各有題目。

²² 李俊承詩，詳見《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頁 7。

其中“宜醉不宜醒”句，延續屈原《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²³之意，表達詩人高潔的特質。香港詩人黎耀楣“滾滾汨羅水，哀哀楚客心。懷才遭世嫉，報國藉屍鍼”，也以“楚客”表達相同的“客居”感受；倪啟紳“最憐身在炎荒外，吊古三湘負卻心”，更抒發流離失所之感。²⁴

早在二十年代已於新加坡舊體詩壇頗享盛名的葉秋濤，其詩的客居之感則沒有這麼強烈，其云：

雙林禪院聚吟朋，午日堂堂紀屈平。綠水青山潛正氣，美人芳草起詩情。道親只覺身難遇，言淡依然意易傾。我自瓣香欣一掬，欲從新社聽新聲。

詩中引用屈原“香草美人”的標誌性意象與“瓣香”典故，秉承舊體詩的創作傳統，“道親只覺身難遇”則表達他鄉遇知音的難能可貴之感，同時透露詩人冀望詩社建立舊體詩社交網絡的意願。林忠傳“海外騷壇嘆寂寥，非關吾輩喜狂驕。胡周新體曾行世，絕律舊詩不合潮”詩句，表達舊體詩因受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排斥而知音難覓的感慨，詩末“際此百花爭蕊放，好邀騷客把魂招”，則與葉秋濤一樣冀望借助詩社雅集以“聽新聲”的願望。²⁵

曾心影（1903-1988），在新聲詩社“戊戌詩人節雅集”（1958）之際被推選為新聲詩社第一任社長。²⁶其詩云：

周南窈窕楚人風，惜頌離騷百代宗。漢水煙波朝暮外，巫山雲雨有無中。靈修不悟孤臣白，芳草多情夕照紅。眾醉憐君醒太苦，招魂詩節九州同。

第一聯的“楚人風”、“百代宗”是指詩歌傳統，第二聯的“漢水”、“巫山”則將意境寄託千里之外的故國，“靈修”、“芳草”代指君王和自己，“醒太苦”、“九州同”則是自我情感的抒發。此詩借歌詠屈原以抒發自己的故國之思，帶有明顯的“客居”色彩和強烈的“中國意識”。與之相似，同是南來詩人的同濟醫院醫師曾志遠，其詩云：“檻外斜暉照石榴，聯吟此日憶神州。湘江潮咽千年恨，獅島魂招

²³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13。

²⁴ 黎耀楣、倪啟紳詩，詳見《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頁7、12。

²⁵ 以上葉秋濤、林忠傳詩，詳見《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頁8、16。

²⁶ 曾心影，福建惠安人，新馬兩地知名報人和作家，戰後《南洋商報》主筆。（柯木林：《世界福建名人錄·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會館，2012，頁276）

萬古愁。”在這類詩作中，經常可見“神州”、“九州”、“國”字眼的出現，大都指向中國，並用“客”字點出詩人的流寓心態。²⁷

另有將思鄉與“思國”相結合之作，如楊文昭詩云：

是醒是醉兩惺惺，湘水依然颯楚風。艾酒何妨迎午節，龍舟空自吊孤忠。羈愁怕入思鄉夢，壯志難消報國衷。偏有詩人閒不過，悲吟爭與付雕蟲。²⁸

劉太希於1960年“庚子詩人節雅集”發表的一首七律，故國之思尤顯，詩云：

南瀛午節萃詞雄，置酒高臺望郢中。百劫山河供鬥蟻，八紘霾霧聽吟龍。勞勞海表投荒意，惻惻湘累去國衷。日晦已無天可問，元音期振楚騷風。²⁹

由於早期雅集的參與者基本都是南來詩人，無論是“投荒意”或“去國衷”，在他們詩作中對故國的關注始終未曾間斷。

在早期四次的“詩人節雅集”中，1961年辛丑雅集在參與者人數、詩作的數量、體裁與題材方面，都達到高峰狀態，此固因前三次雅集的積澱，也因南洋大學師生的參與。南洋大學是一所由東南亞華人捐建、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正式成立於1955年；生物系黎國昌教授是最早與新聲詩社往來的南大詩人，參與了1958年戊戌雅集。1960年3月，南大舉辦第一屆畢業典禮，邀請新馬詩界名流在雲南園舉行雅集，新聲詩社的謝雲聲、曾心影、葉秋濤、許乃炎、陳寶書等廿餘位詩人參加雅集，全部詩作收錄於《雲南園吟唱集》。1961年辛丑詩人節，新聲詩社成員與南大師生在陳六使的丹絨禺寓所雅集，出版《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謝雲聲致辭中以“炎荒地燠，草樹恒春。南國風淳，人物信美”³⁰開端，“信美”二字見於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³¹此語或有一定的客居之感，但對南洋風物也表達了讚賞之情。

綜觀1961年辛丑雅集題材，已不再局限於歌詠屈原與雅集盛況，出現了以時事入詩、描寫本地生活與南洋風物之作，如洪來儀的“園裏香浮椰結子，林端

²⁷ 曾心影、曾志遠詩，詳見《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頁8-9。

²⁸ 楊文昭詩，詳見《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頁12。

²⁹ 劉太希詩，詳見《庚子詩人節雅集》，《南洋商報》1960年7月3日。

³⁰ 謝雲聲：《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62，頁1。

³¹ [南朝梁]蕭統、[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90。

秀挺竹生孫”，但“單純描寫南洋色彩並不即等於具有本土意識，作者怎樣看待自己的去留才是關鍵”。³² 關於詩人的自身去留與身份認同，曾志遠七律詩云：

星門天險已成空，三島煙雲一夢中。獨立橋邊芳草路，丹絨海畔落花風。
去來千里潮相似，聚散十年人不同。最是隔江春望好，萬峰青到水樓東。³³

詩中“去來千里潮相似，聚散十年人不同”句，似是詩人對自我身份的反思：千里外的“潮水”與此處有何不同呢？而幾十年來詩人的生活已發生了變化。

由於早期新聲詩社社員以南來文人為主，雖然辛丑詩人節雅集詩作中出現關於南洋風物和本地生活的書寫，但整體上並未呈現明顯的“本土意識”，而由“客居”引發的“故國之思”卻從未中斷，且帶有強烈的“中國意識”。這種情況在相隔十年後的詩人節雅集，詩作中的“本土意識”則開始發生轉變。

三、“中國意識”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呈現

自1970年陳寶書擔任社長以來，詩社逐漸恢復運作，開啟社課活動。社課活動每月一次，由社員或詩友輪流命題。據《南洋商報》載，1972年第17期社課以“杜鵑”為題，詩人既可以“南洋遍地皆有”的杜鵑花為題，也可以中國傳統詩歌中的“子規”鳥為意象。³⁴ 其中一些詩作仍然流露強烈的故鄉意識，如蔡映澄《杜鵑》詩：“叫月聲隨斷續風，曉看啼血染花紅。閒情猶復催歸去，未解慈闈竟已空。”以“杜鵑啼血”的典故抒發對故鄉親人已不在的悲痛。劉楚材“客愁無那況清明，月色空山百緒縈。忽聽不如歸去也，何人不起故鄉情”，仍然表達“不如歸去”的思鄉之情；林忠傳“無端風雨送春歸，花事闌珊日日稀。忽聞子規啼不斷，庭前徒倚吊芳菲”，其與傳統詩歌“傷春”一脈相承的情感，顯然來自一種對故國的想象。³⁵ 此類“傷春”之作在《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1981）中比比皆是，而其社課選題一直兼有南洋風物（詠樹膠、榴槤、星洲十二景等）與故國之思（詠梅花、感時、詠史等）等。

³² 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東方文化》2015年第1期，頁103。

³³ 曾志遠詩，詳見《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特刊》，頁15。

³⁴ 詳見《新聲詩社闡述杜鵑社課經過》，《南洋商報》1972年6月26日。

³⁵ 蔡映澄、劉楚材、林忠傳詩，詳見《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1，頁53、99、116。

在 1971 年以後的雅集詩作中，出現一些與此前不同的主題。首先，在一些詩作中出現對自我身份認同的“雙重肯定”，這與此前詩人的“客居”之感明顯不同，例如 1977 年丁巳雅集的林柏麟作品，云：

佳節端陽角黍香，猶傳漢俗在殊鄉。南洲有幸杯同把，湘水無情恨獨長。濟濟騷人欣雅集，鏗鏘鉢韻賴宣揚。高歌一曲行雲過，三日餘音尚繞梁。

詩中雖稱“殊鄉”，但本地已為詩人的又一“鄉”，在故鄉和“殊鄉”之間，詩人的感受是“南洲有幸”而“湘水無情”，顯然更加認同本地生活。再看看此次雅集中許乃炎的詩作，云：

屈子如今已不沉，無需澤畔續行吟。離憂消盡餘風雅，四海為家愜素心。³⁶

在詩人眼中，如今已無需再“行吟”，“四海”皆可“為家”，這種對自我“雙重身份”的肯定與同時期潘受、張濟川詩的“雙鄉意識”十分相似。

其次，後期的詩人節雅集詩作中流露出對在地生活與社會方面的關注。如許乃炎於 1983 年癸亥雅集詩云：“小店租營十八年，今朝被迫鬧搬遷。幾經挫折襟猶闊，歷盡崎嶇骨更堅。”³⁷ 此詩主題顯然已與詩人雅集沒有直接關聯，而是抒寫詩人的在地生活感受。方煥輝詩則寄寓其對本地華文教育的擔憂，云：

風雅誰從海外尋，且憑艾酒豁胸襟。湘江渺渺空餘恨，郢曲悠悠孰會心。競渡已忘投黍意，朗吟如聽繞梁音。獨憐域外猶三楚，未辨縱橫速禍深。

隨著新加坡華文教育衰微，詩人擔憂華人將逐漸忘卻“投黍意”，而舊體詩也將如其他傳統文化一起被丟棄。馬宗薌《八聲甘州・己未端陽前三日韓江酒樓雅集倚聲賀社慶兼吊屈原大夫》一詞，則將詩社傳統看作振興本地文教的一種方式，而稱“南國吟風盛，華族之光”，下片又云：

共仰靈均忠蓋，失意離故國，哀郢沉湘。恰當端午近，誰不憶湘江。

³⁶ 林柏麟、許乃炎詩，詳見《新聲詩社丁巳端陽雅集詩詞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77，頁 5-7。

³⁷ 許乃炎詩，詳見《新聲詩社癸亥端陽節詩詞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3，頁 8。

喜今朝，苔岑咸集，慶典中，憑吊未嘗忘。都深解，重詩人節，社譽彌彰。³⁸

相比“失意離故國”的屈原，詩人此時“喜今朝，苔岑（詩友）咸集”，冀望通過詩人節雅集與其他詩社活動，弘揚華人文化傳統，振興本地華文文教，使得“社譽彌彰”。方煥輝與馬宗薌的一詩一詞都作於1979年己未雅集，此時新加坡華校與華教同時在走下坡路，南洋大學最終也於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並採用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關於“中國意識”（早期亦稱“僑民意識”）與“本土意識”的界定，黃錦樹闡述為“前者指向自身文化、宗族、肉身的根源”，後者則“直指現實的存在”（關切在地的社會、政治議題）。³⁹上述詩人對在地生活感受與本地文教的關注，正是黃錦樹所指的“本土意識”的表現，可見在此類詩作中，傳統的“中國意識”已在轉變，而較為明顯的是“在地意識”或“本土意識”的呈現。

再次，後期的詩人節雅集詩作，從“國粹”到“漢粹”或“唐粹”的措辭轉變，也是“中國意識”淡化的表現。在早期的雅集，詩人常用“國粹”代表舊體詩詞或傳統文化，而在1983年癸亥雅集，李金全則稱“揚漢粹，賴諸公”；出生於印尼的華僑詩人林雲峰則云：“盟誓繼將吟嘯舉，力揚唐粹化南邦。”⁴⁰由此可見，社員中除了早期的南來詩人，也有一些新、馬和印尼出生的華僑詩人，而他們的詩作中不再出現“國粹”字眼，較多使用“漢粹”的說法。

最後，當1985年詩人節雅集有了廣州詩社的參與，面對從中國到來的“客人”，新聲詩社的詩人們則完成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在詩詞中以主人姿態向中國詩人介紹新加坡名勝，其中以馬宗薌《臨江仙·步楊應彬先生韻》最為典型：

先生遠遊期未定，原非吉日先涓。一朝承約到南天，準時機降落，旅客湧如泉。島國樹林真茂盛，四周滿布綠園。裝潢恰似美青年。料騷人賞罷，心緒感怡然。

與此同時，與“中國意識”的轉變形成強烈的對比，南來詩人張濟川詩中已開始展露一種全球視角與“博愛”情懷，云：

³⁸ 方煥輝、馬宗薌詩詞，詳見《新聲詩社慶祝廿二周年紀念暨己未詩人節雅集詩詞特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79，頁13、10。

³⁹ 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頁172。

⁴⁰ 李金全、林雲峰詩，詳見《新聲詩社癸亥端陽節詩詞輯》，頁5、10。

兩岸春花一樣紅，寰球勿復計西東。美蘇賀歲天同戴，東越流民道未通。非亞炎情猶待拯，中東霸氣妄爭雄。人間擾攘何時了，爭奈升平總落空。⁴¹

“勿復計西東”是對“本土意識”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升華。在同時期的社課活動中，雖然帶有“中國意識”的詩作仍佔一定的比重，但整體上“本土意識”或“在地意識”的呈現，也比早期的詩人節雅集作品更為明顯了。

結語

舊體詩的創作需要詩人在題材、意象、歷史典故和語言等方面，都對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定的掌握，因而從事舊體詩創作的詩人，其與中國或中國文化的關係更難割開。本文所述“中國意識”的轉變，是與新加坡在地“本土意識”的呈現相對而言，“詩人節”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密切，因此早期的新聲詩社端午雅集作品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意識”，雖於1961年辛丑雅集中也有對“南洋風物”的書寫，但仍未呈現明顯的“本土情懷”。相隔十餘年後，詩人節雅集作品開始出現詩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雙重肯定”，對本地生活及文教事業的關注，並表達了詩社應該承擔振興本地華文文教的願望，旨於通過詩社的社會作用以推動個人的身份認同。這種“中國意識”的轉變原因，一方面是社員構成的變化，從早期以南來詩人為主導，後期則包括已成為新加坡公民的“南來文人”，以及在新、馬和印尼出生的詩人；另一方面，自新加坡建國以來，官方不斷強調的“國家意識”也影響了詩人們的創作意向。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意識之間並不是絕對的“此消彼長”，詩作中流露的情感與詩人的個人感受密不可分，詩人們看待問題的視角也不盡相同，並非完全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變。新聲詩社的一些詩人，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始終流露強烈的“中國意識”。到了八九十年代的社課中，其“中國意識”的表現形式也變得豐富多樣，有關心中國時事、故鄉時令之作，也兼有題詠南洋風物和故鄉風物之作。隨著新加坡華文文教式微，“中國意識”的轉變或“消滅”，則與新聲詩社成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作品，形成頗為鮮明的對照。

⁴¹ 馬宗薌、張濟川詩詞，詳見《中國廣州詩社、新加坡新聲詩社乙丑年文化交流詩詞合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5，頁31、25。